

# 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社会特征对 个人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基于CGSS2017数据的分析

王 博

北京师范大学文理学院, 北京

收稿日期: 2023年8月12日; 录用日期: 2023年9月6日; 发布日期: 2023年9月14日

## 摘 要

本文利用Stata软件分析了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 研究了个人、家庭和社会特征对个人幸福感的影响。个人特征方面考察了性别、年龄、政治面貌、锻炼情况和媒体偏好对幸福感的影响。家庭特征方面探讨了家庭房产数量对幸福感的影响。社会特征方面则研究了地理位置对幸福感的影响, 并采用二维列联表和Logistic回归进行分析, 得到了各省份平均幸福指数, 并对个人幸福感的影响变量进行了合理分析。

## 关键词

Logistic回归, 二维列联表, 个人幸福感, 幸福指数

#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Family Characteristics and Social Characteristics on Personal Happiness

—Analysis Based on CGSS2017 Data

Bo Wang

Faculty of Arts and Sciences,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Received: Aug. 12<sup>th</sup>, 2023; accepted: Sep. 6<sup>th</sup>, 2023; published: Sep. 14<sup>th</sup>, 2023

## Abstract

In this paper, Stata software is used to analyze the 2017 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 data to study the impact of individual, family and social characteristics on individual happiness.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were examined to see how gender, age, political affiliation, exercise and media preferences affected happiness. In the aspect of family characteristics, the influence of household property quantity on happiness is discussed. In terms of social characteristics, the influence of geographical location on happiness is studied, and the average happiness index of each province is obtained by using two-dimensional contingency table and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the influencing variables of individual happiness are reasonably analyzed.

## Keywords

Logistic Regression, Two-Dimensional Contingency Table, Individual Happiness, Happiness Index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引言

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已经踏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而社会所面临的主要矛盾也逐渐演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随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不断提升,我国的发展已经站在了新的十字路口。然而,与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态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居民对个人幸福感的评价却陷入了停滞甚至下降的困境。

根据联合国公布的《2019年世界幸福指数报告》,我国在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中,居民的幸福指数仅为5.191,位居第93位,较2018年下降了7个名次。这一数据的背后凸显了一个迫切问题:如何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确保人民群众的幸福得到提升,从而实现经济发展水平与居民幸福感的协调?

## 2. 研究背景

学术界对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的研究大致可以从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社会特征三个角度进行探讨。在个人特征方面,石郑(2020)提出外貌可能对个体的主观幸福感产生积极影响[1]。黄嘉文(2013)则认为个人的教育水平对城市居民的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尤其是中专、高中和大学及以上学历的人群幸福感更为显著[2]。此外,孩子的性别也被发现影响着父母的幸福感,研究表明女儿对于老年父母的幸福感影响较大。

在家庭特征方面,刑占军(2011)对过去的收入与幸福感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收入与幸福感呈正向相关,高收入群体的幸福感普遍高于低收入群体[3]。而在社会特征方面,胡晓鹏等(2020)的研究发现养老保险对自评幸福感有明显提升作用,同时子女数量和养老保险对农民幸福感产生互补效应[4]。另一项研究由孙三百等(2014)进行,他们利用中国微观调查数据发现城市规模与幸福感之间存在U型曲线关系,市辖区人口规模约为300万人左右时幸福感最低[5]。

因此,本研究从个人特征(年龄、性别、政治面貌、体育锻炼程度、新旧媒体偏好)、家庭特征(是否拥有房产)以及社会特征(住址所在省份)三个角度出发,分析了这些因素对个人幸福感的影响程度。通过

这一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不同因素在影响幸福感方面的作用，为进一步促进社会的幸福和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

### 3. 研究数据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源自 2017 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该调查项目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于 2003 年发起，旨在进行全国范围内的大型连续性随机抽样调查。每次调查涵盖超过 10 万户家庭，系统性地收集个人、家庭、社区和社会等多个层面的数据。2017 年的 CGSS 调查收集了 12,582 份有效问卷。

本研究利用的数据包括以下变量：a2 (性别)、a31 (出生日期)、a36 (个人幸福感)、a29 (偏好的媒体形式)、a65 (家庭拥有房产数量)、a10 (政治面貌)、s41 (被调查者所在省份)，此外还构建了变量 newmedia (新旧媒体偏好)、age (年龄)、happy (幸福或不幸福)。

研究开始时，我们对调查对象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在性别方面，调查涵盖了 5792 名男性，占总调查人数的 47.4%，以及 6426 名女性，占总调查人数的 52.6%。关于年龄，年轻人(18~25 岁)的人数为 967 人，占总调查人数的 7.8%；壮年人群(26~40 岁)的人数为 2701 人，占 21.78%；中年人群(41~55 岁)的人数为 3733 人，占 30.43%；老年人群(55 岁以上)的人数为 4958 人，占 39.99%。

这些数据为研究提供了基本的背景信息，为后续分析提供了重要的参考。通过对这些数据的细致分析，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各个变量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对幸福感的影响程度，为研究的结论提供可靠的依据。

### 4. 变量解释

a2 (性别)男性值为 1，女性值为 2。

a31 (出生日期)数据最小值为 1914，最大值为 1999，因此可知调查对象为成年人。

a36 (个人幸福感)值为 1 表示非常不幸福，值为 2 表示比较不幸福，值为 3 表示说不上幸福不幸福，值为 4 表示比较幸福，值为 5 表示非常幸福。

a29 (偏好的媒体形式)值为 1 代表报纸，值为 2 代表杂志，值为 3 代表广播，值为 4 代表电视，值为 5 代表互联网(包括手机上网)，值为 6 代表手机定制消息。

a65 (家庭拥有房产数量)。

a10 (政治面貌)值为 1 代表群众，值为 2 代表共青团员，值为 3 代表民主党派，值为 4 代表共产党员。

s41 (被调查者所在省份)除新疆、西藏、海南、台湾没有数据其他省份均有数据。

age (年龄) 18~25 岁青年值为 1，26~40 岁壮年值为 2，40 岁到 55 岁中年值为 3，55 岁以上老年值为 4。

newmedia (新旧媒体偏好) 偏好新媒体值为 1，偏好传统媒体值为 0，新媒体为互联网及手机定制消息，旧媒体为报纸，杂志，广播，电视。

happy (幸福或不幸福)不幸福值为 0，幸福值为 1。

这些变量将用于研究中，以分析它们对个人幸福感的影响。根据这些变量，研究可以进一步深入探讨不同因素对幸福感的贡献程度，从而为了解幸福感的形成机制提供更详细的视角。

### 5. 研究方法

在本节中，我们将介绍采用的研究方法，旨在深入分析各个变量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对个人幸福感的影响。我们将逐步描述采取的分析方法，以期研究结果提供更准确和有力的支持。

首先，我们对解释变量与因变量 a36 (个人幸福感)进行了二维列联分析，同时呈现了不同幸福指数的占比。通过这一步骤，我们初步探讨了不同变量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它们与个人幸福感之间的联系。这

种分析方法有助于捕捉到变量之间的初步趋势和模式。

其次，在探讨省份与个人幸福感的关系时，我们首先计算了各省份的平均幸福指数，并随后绘制了各省人均幸福指数的热力图。通过对热力图的观察，我们可以直观地了解各个省份之间的幸福指数分布情况，从而推测出省份和个人幸福感之间的可能关联。这一可视化分析方法帮助我们空间角度考察变量之间的潜在联系。

为了更深入地挖掘变量之间的关系，我们构建了新的二分变量 **happy**，并运用二项 Logistic 回归分析方法。通过这种方法，我们能够预测因变量(个人幸福感)的可能性，基于各个解释变量的影响。为了评估模型的可信性，我们进行了模型的合理性判断。进一步，我们提供了边际效应分析图，以直观地呈现不同解释变量对个人幸福感的影响程度。

综合运用这些研究方法，我们的目标是更全面地理解各个变量对个人幸福感的影响，并深入揭示变量之间的复杂关系。通过这一分析框架，我们将为研究结果的解释提供深刻和准确的支持，为幸福感与各个变量之间的关联提供更具体的洞察。

## 6. 实证分析

### 6.1. 个人特征

表 1 展示了性别与个人幸福感之间的二维列联统计结果。从分布比例的角度来看，有 23.36% 的男性选择了不幸福，而 76.63% 的男性选择了幸福。对比之下，21.22% 的女性表示不幸福，而 78.78% 的女性则感到幸福。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选择非常幸福的女性比例较选择非常幸福的男性高出 2.79%。基于这些数据，我们初步推断女性的幸福感较男性略高。

**Table 1.** Contingency statistics on gender and personal happiness

**表 1.** 性别与个人幸福感的列联统计表

性别	非常不幸福	比较不幸福	说不上幸福	比较幸福	非常幸福	Total
男	105 1.77%	423 7.14%	856 14.45%	3554 60.01%	894 16.62%	5992 100%
女	111 1.57%	435 6.55%	863 13.00%	3948 59.47%	1282 19.31%	6339 100%
Total	216 1.67%	858 6.83%	1719 13.69%	7502 59.72%	2266 18.04%	12,561 100%

从平均比例的角度来看，选择不幸福的男性比例高于整体样本比例，而相反，选择幸福的男性比例则小于整体样本比例。这一趋势也印证了前述观点，可能的原因在于男性在社会中肩负更多责任，面临更大压力，因此他们的幸福感相对较低。女性则可能因其在社会中的角色与压力较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较高的幸福感。

总之，基于表 1 的分析，我们可以初步认为女性的幸福程度稍微高于男性。这种趋势可能受到社会角色和责任的影响，使得男性的幸福感相对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然而，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以确定这一趋势的背后机制。

表 2 呈现了新旧媒体偏好与个人幸福感之间的二维列联分析结果。从主观角度而言，针对新旧媒体的偏好似乎与个人幸福感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关联。然而，通过详细的二维列联分析，我们发现偏好新媒体(包括互联网和手机定制消息)的个体中，有 81.08% 选择了幸福。与之相比，在偏好旧媒体(报纸、杂志、

广播和电视)的个体中,选择幸福的比例为75.43%,两者之间的差异高达5.65%。这一差异是男女性选择幸福的比例差异的两倍,从而强有力地支持了偏好新旧媒体与个人幸福感之间存在一定关联的观点[6]。

**Table 2.** Incidental statistics of media types used and personal happiness

**表 2.** 使用媒体类别与个人幸福感的列联统计表

性别	非常不幸福	比较不幸福	说不上幸福	比较幸福	非常幸福	Total
男	163 2.21%	613 8.32%	1035 14.04%	4227 57.35%	1333 18.08%	7371 100%
女	53 1.02%	245 4.72%	684 13.18%	3275 63.10%	933 17.98%	5190 100%
Total	216 1.72	858 6.83%	1719 13.69%	7502 59.72%	2266 18.04%	12,561 100%

进一步深入分析,我们可以推测新媒体的发展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人们的幸福感。这种可能性可以归因于多个因素,例如短视频为人们带来的愉悦感,以及通过互联网和手机随时随地与亲朋好友保持联系所带来的幸福感提升[7]。这些变化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偏好新媒体的个体在幸福感方面表现出较高的趋势。

表 3 呈现了体育锻炼次数与个人幸福感之间的二维列联分析结果。数据表明,每天进行锻炼的个体在选择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比例高达86.66%。然而,随着锻炼次数的减少,选择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比例逐渐降低。一周数次锻炼的个体比例为83.18%,一月数次锻炼的个体比例为76.72%,一年数次或更少锻炼的个体比例为76.78%,而从不锻炼的个体比例仅为72.78%。这一趋势使得每天锻炼与不锻炼之间的差值达到了13.88%。这充分说明锻炼次数与个人幸福感之间存在着正向关联,并且锻炼在幸福感提升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Table 3.** Contingency statistical table of exercise frequency and personal happiness

**表 3.** 锻炼频率与个人幸福感的列联统计表

锻炼频率	非常不幸福	比较不幸福	说不上幸福	比较幸福	非常幸福	Total
每天	20 0.92%	73 3.35%	198 9.07%	1254 57.47%	637 29.19%	2182 100%
一周数次	19 0.89%	99 4.61%	243 11.32%	1387 64.63%	398 18.55%	2146 100%
一月数次	13 1.24%	63 4.61%	168 16.03%	645 61.55%	159 15.17%	1048 100%
一年数次或更少	16 1.07%	95 6.38%	235 15.77%	913 61.28%	231 15.50%	1490 100%
从不	148 2.61%	526 9.26%	872 15.35%	3293 57.99%	840 14.79%	5679 100%
Total	216 1.72	856 6.82%	1716 13.68%	7492 59.72%	2265 18.06%	12,545 100%

锻炼次数与个人幸福感之间的正向关联可从多个方面得以解释。首先,锻炼有助于增强体质,保障

身体健康，从而为个体带来更多的生活舒适感和幸福感。其次，在锻炼的过程中，身体释放出愉悦感激素，有助于减轻压力、焦虑和抑郁情绪，进而产生愉悦感，从而提升个人的幸福感。锻炼成为一种积极的生活方式，可以带来生理和心理上的积极体验，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锻炼次数与幸福感之间存在如此明显的正向关联。

综上所述，通过表 3 的分析结果，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锻炼次数与个人幸福感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锻炼不仅有助于身体健康，还能够释放愉悦感激素，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个人的幸福感。这一结果为促进健康生活方式和幸福感的提升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 6.2. 家庭特征

表 4 呈现了家庭拥有房产数量与个人幸福感之间的二维列联分析结果。数据中拥有 7 套房产及以上的样本数量较少，因此上表中未给出。在未拥有房产的个体中，选择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比例为 69.82%。相比之下，拥有一套房产的个体比例为 76.98%，拥有两套房产的个体比例为 85.74%，拥有三套房产的个体比例为 92.08%，拥有四套房产的个体比例为 89.06%，拥有五套房产的个体比例为 90.63%。从中我们可以得出，拥有房产数量的增加对个人幸福感的提升具有显著影响。此外，随着拥有房产数量的增加，选择非常幸福的比例总体上呈现增加趋势。

**Table 4.** Contingency statistics of the number of houses and personal happiness

**表 4.** 房产数量与个人幸福感的列联统计表

房产数量	非常不幸福	比较不幸福	说不上幸福	比较幸福	非常幸福	Total
0	41 3.56%	118 10.23%	189 16.39%	615 53.34%	190 16.48%	1153 100%
1	163 1.74%	672 7.16%	1326 14.12%	5647 60.14%	1581 16.84%	9389 100%
2	10 0.65%	57 3.68%	154 9.94%	979 63.16%	350 22.58%	1550 100%
3	0 0.00%	2 0.83%	17 7.08%	141 58.75%	80 33.33%	240 100%
4	0 0.00%	1 1.56%	6 9.38%	33 51.56%	24 37.50%	5679 100%
5	0 0.00%	0 0.00%	3 9.38%	20 62.50%	9 28.13%	32 100%
Total	214 1.72	851 6.84%	1697 13.64%	7441 59.82%	2236 17.98%	12,439 100%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家庭拥有房产数量是影响个人幸福感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当家庭拥有的房产数量达到 3 套后，进一步增加房产数量对个人幸福感的影响已不再明显。这一结论为理解家庭拥有房产数量与个人幸福感之间关系提供了有益的信息[8]。

图 1 展示了家庭拥有房产数量和锻炼次数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在该图中，两个变量的 p 值均显示显著性水平较低，这表明家庭拥有的房产数量以及锻炼次数与个人幸福感之间存在紧密的关联。通过分析所得的 OR 值，我们得出结论：当房产数量增加一个单位时，个人幸福感指数提升约 1.46 倍。同时，由于锻炼次数变量中，1 代表每天锻炼，5 代表从不锻炼，随着锻炼次数的增加，即锻炼时间减少，

个人幸福感指数为原来的 0.81 倍。

Logistic regression		Number of obs		=		12,444	
Log likelihood = -6444.4174		LR chi2(2)		=		323.66	
		Prob > chi2		=		0.0000	
		Pseudo R2		=		0.0245	
happy	Odds Ratio	Std. Err.	z	P> z	[95% Conf. Interval]		
a65	1.462691	.0590832	9.41	0.000	1.351355	1.583199	
a309	.8170731	.0118898	-13.88	0.000	.7940986	.8407121	
_cons	4.874336	.3592324	21.49	0.000	4.218742	5.631809	

Note: \_cons estimates baseline odds.

Figure 1.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property quantity and exercise frequency

图 1. 房产数量与锻炼频率的逻辑回归分析

图 2 呈现了 Logistic 回归的边际效应图，从图中可以明显观察到，随着房产数量的增加，从不锻炼和每天锻炼的个人幸福感指数之间的差异逐渐减小。因此，可以推测房产数量对于个人幸福感的影响，相较于锻炼次数而言，可能更加显著。与此相反，当房产数量较为有限时，不同锻炼次数对个人幸福感的影响则更加显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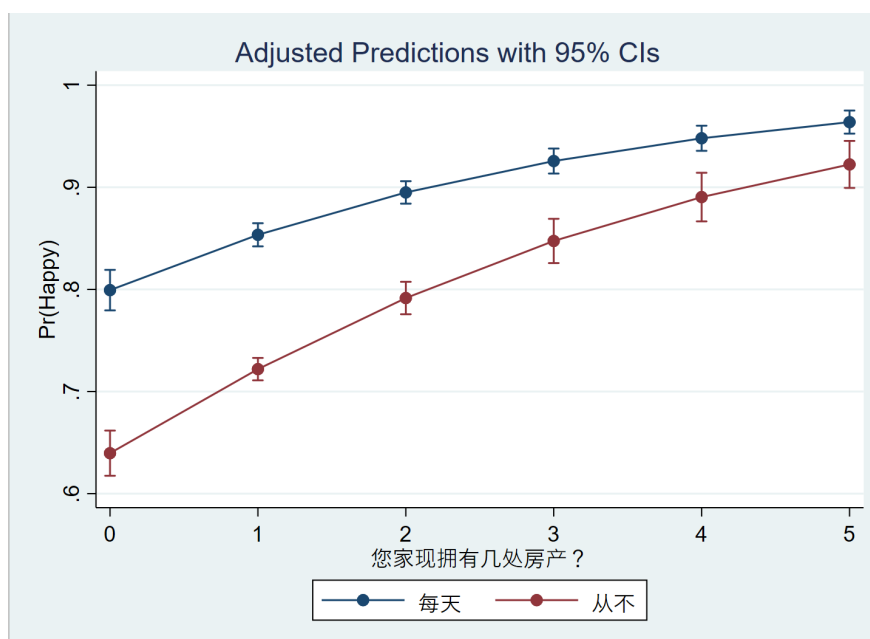


Figure 2. Logistic regression marginal effect of number of properties and frequency of exercise

图 2. 房产数量与锻炼频率的逻辑回归边际效应图

### 6.3. 社会特征

通过对被调查者所在省份与个人幸福感的二维列联表数据的分析，我们制作了表 5，展示了各省的平均幸福指数。需要注意的是，图中省份未包含表新疆、西藏、海南和台湾这四个省份，并不意味着这些地区的平均幸福指数较低。而是因为本研究所使用的 CGSS2017 数据未包含这些省份的信息，因此未将其纳入分析范围。

**Table 5.** The average happiness index table of Chinese provinces  
**表 5.** 中国各省的平均幸福指数表

省份	幸福指数	省份	幸福指数
江西	3.491054	贵州	3.496667
云南	3.657074	湖南	3.692771
广西	3.711055	重庆	3.723333
吉林	3.744048	福建	3.749164
湖北	3.754651	陕西	3.780856
广东	3.786713	安徽	3.820574
黑龙江	3.824320	四川	3.838284
宁夏	3.858586	甘肃	3.88
山西	3.90429	内蒙古	3.909091
江苏	3.915493	浙江	3.941414
河南	3.941667	辽宁	3.96798
天津	3.9925	北京	4.012048
山东	4.035	青海	4.05
河北	4.057626	上海	4.06383

总体而言，从数据结果来看，北方城市的平均幸福指数较南方城市更高。具体而言，北京、上海、河北、山东和青海等省份的平均幸福指数位于前列。这与之前所进行的各省平均 GDP 比较有所不同，显示出平均 GDP 较高并不一定导致平均幸福指数更高。这一结果与常规的认知有所出入。例如，广东作为一个拥有两个一线城市的省份，并未在平均幸福指数中位居前列，这与预期不符。此外，青海省的平均幸福指数也令人意外，排名仅次于上海和河北。

对于北方城市平均幸福指数较高的现象，有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北方人的性格更加豁达，相较之下，南方人可能较为细腻。这导致南方人可能因为琐碎小事而影响心情，进而降低个人幸福感。北方人则天生较为乐观和开朗，对小事看得开，因此其个人幸福感可能相对较高。这种解释能够一定程度上解释北方与南方城市平均幸福指数之间的差异。

## 7. 研究结论

在个人特征方面，性别对个人幸福感的影响相对较小，然而女性的个人幸福感稍高于男性。关于新旧媒体偏好，研究显示偏好新旧媒体与个人幸福感之间存在一定关联，偏好新媒体的个体表现出较高的幸福感，相较于偏好传统媒体的个体。体育锻炼次数在个人幸福感方面也有积极作用，其正向影响较为显著。随着锻炼次数的增加，个人幸福感呈现出递增的趋势。

在家庭特征方面，家庭拥有的房产数量与个人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关联。该关系为正相关，一般而言，家庭拥有的房产越多，个人的幸福感可能越高。然而，当房产数量达到一定水平后，对个人幸福感的提升趋势逐渐减缓，已不再明显[9]。

就社会特征而言，各省份的平均幸福指数呈现出或多或少的差异。总体而言，北方地区的个人幸福感稍高于南方地区。需要注意的是，并不能一概而论地认为平均 GDP 高的省份个人幸福感就一定较高。



例如, 广东、青海等地, 以及一线城市和三线城市之间的平均幸福指数并不总是保持一致。

在综合考量这些结果时,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个人幸福感受到多个因素的影响。性别、媒体偏好、体育锻炼、年龄、政治面貌、家庭房产以及所在地区均对个人幸福感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这些发现为进一步了解个人幸福感的形成机制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 为制定幸福感提升的政策和策略提供了参考依据。

## 参考文献

- [1] 石郑. 外貌的幸福效应——基于 CLDS (2016)的实证分析[J]. 西北人口, 2021, 42(2): 85-94.
- [2] 黄嘉文. 教育程度、收入水平与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一项基于 CGSS2005 的实证分析[J]. 社会, 2013, 33(5): 181-203.
- [3] 邢占军. 我国居民收入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J]. 社会学研究, 2011, 25(1): 196-219+245-246.
- [4] 胡晓鹏, 李昕. 养老保险提升中国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实证研究[J]. 上海经济研究, 2020(7): 66-80.
- [5] 孙三百, 黄薇, 洪俊杰, 等. 城市规模、幸福感与移民空间优化[J]. 经济研究, 2014, 49(1): 97-111.
- [6] 庞子玥, 曾鸣. 互联网使用影响青年主观幸福感了吗?——来自 CGSS2010-2015 年数据的分析[J]. 西安财经大学学报, 2020, 33(3): 71-77.
- [7] 周广肃, 孙浦阳. 互联网使用是否提高了居民的幸福——基于家庭微观数据的验证[J]. 南开经济研究, 2017(3): 18-33
- [8] 王敏. 住房、阶层与幸福感——住房社会效应研究[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33(4): 58-69.
- [9] 李涛, 史宇鹏, 陈斌开. 住房与幸福: 幸福经济学视角下的中国城镇居民住房问题[J]. 经济研究, 2011, 46(9): 69-82+160.